

《法華經》 在日本的流傳

以優美的文字與深邃的義理而被譽為「經中之王」的《法華經》，自譯出以來，不只在中國受到歷代僧俗大眾的傳誦與修學，更向外傳播到了東亞各地，影響及於整個漢傳佛教圈，其中又以日本為最。以宗派思想方面來說，除了在平安時代(794~1185)初期由傳教大師最澄開展出了日本天台宗之外，又在鎌倉時代(1185~1333)中期時由一位漁師之子日蓮，開創了極富日本特色的宗派——日蓮宗，兩者傳承至今而不絕。

然而，宗派的產生，只是《法華經》影響日本的其中一部分。其實，不論在文學、藝術，抑或是國家政治、民間信仰等層面，都能夠看到《法華經》的蹤影，甚至連日本樹鶯(ウグイス)也因為其叫聲「ホー、ホケキヨ」聽起來像是發出日文中「法華經」的音，而被稱為誦經鳥呢！不得不說《法華經》是與日本特別有緣而應機的經典。

接下來，就讓我們以佛教在日本的歷史發展為背景，來追溯在宗派思想之外，《法華經》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吧！

佛教的傳入與蘇我氏

根據目前學界普遍的說法，佛教於538年由當時朝鮮三國(高句麗、百濟、新羅)之中的百濟傳入日本列島，因為是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官方管道流傳，又稱為「佛教公傳」。相對於官方管道，在史料中雖也曾有記載6世紀初渡來人(從中國或朝鮮半島等地前往日本定居的外來移民)私底下的佛教信仰情形，但大略言之，基本上可以認為佛教是於6世紀傳入日本。

沒想到，在佛教傳入日本之初，引發了一場崇佛與排佛之間的爭執。

日本最早的官修史書《日本書紀》(約720年成書)中記載，百濟聖王



傳教大師最澄



日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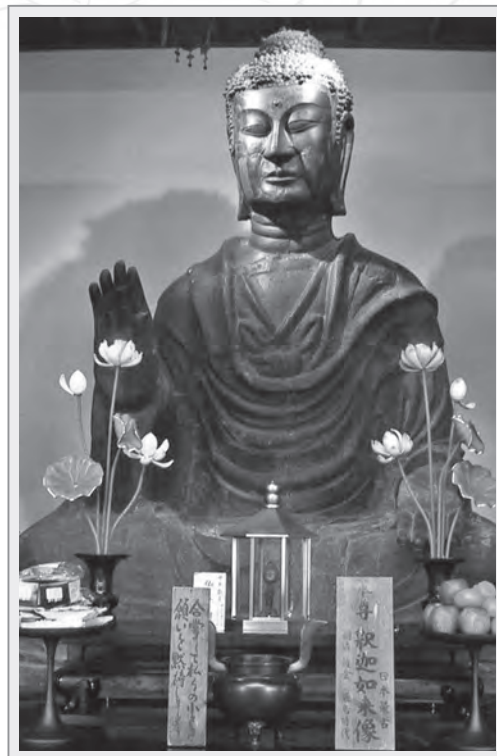
(523~554在位)遣使餽贈當時在位的欽明天皇釋迦佛像一尊，以及幡蓋及經書等物。第一次接觸到佛教的欽明天皇，不禁為佛法的深邃與佛像的莊嚴所深深打動。

然而，是否要接受佛教信仰在日本流傳，卻非天皇一人所能決定。事實上，在當時大和朝廷的王權結構之下，豪族勢力對政治決策具有重大影響。天皇向眾臣諮詢意見，針對是否應當禮拜這尊從外國來的神，卻在兩派豪族——支持佛教的蘇我氏，以及反對佛教的物部氏、中臣氏——之間引發了爭端。

最後經過了數代天皇期間的衝突，蘇我氏於587年的政變中擊敗物部氏後，不但於政治上開始專權，也加深了佛教信仰在朝廷內的優勢地位。蘇我氏更於隔年開始興建日本第一座具有正式伽藍規模的佛教寺院——飛鳥寺（法興寺）。由此佛教在日本開始有了發展的機會。

聖德太子

在蘇我氏的支持下，佛教於6世紀後葉漸漸站穩腳步。然而佛教在當時的日本要奠定之後興盛發展的基礎，則有待於聖德太子的活動。關於其生平及事蹟，《日本書紀》及平安時代成書的《聖德太子傳曆》等史料中雖然有所記載，但多屬於傳說，因此也有學者提出了聖德太子虛構論的說法。無論



飛鳥寺中供奉日本最古老釋迦佛像



飛鳥寺大殿

如何，聖德太子仍廣為日本人民敬仰，甚至在舊版的一萬元鈔票上，就印有他的畫像。

聖德太子(574~622)為用明天皇與穴穗部間人皇女之子，傳說其母於馬廄前分娩，故名為廄戶皇子，也稱豐聰耳皇子或上宮太子。由於父母兩人的母親皆為蘇我氏出身，聖德太子血緣上也與蘇我氏有著密切的關係。在崇仰佛法的環境中成長，他不但自幼表現出對佛教深厚的信心，同時也有著過人的穎悟。

在姑母(用明天皇之妹)同時也是日本第一位女天皇——推古天皇(592~628在位)即位後，聖德太子成為攝政。此後在世俗政治的領域中，不只推動了遣

隋使的派遣以吸收中國文化，更制定了冠位十二階及憲法十七條等官階選才制度及官員行為準則，盼望削弱豪族勢力，構築為一個以天皇為核心的國家。其中也可見到佛教信仰的影響：例如憲法十七條中的第二條，即誠示官員要「篤敬三寶」，更說三寶者乃「四生之終歸」、「萬國之極宗」，認為佛法信仰能協助教化民眾。至於在佛教文化的層面，據說他不但向高句麗高僧慧慈等人學習，更建造了斑鳩寺(今法隆寺)及四天王寺。

不論世間或出世間，太子都留下了許多豐功偉業。而聖德太子與《法華經》之間，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如他曾於宮中向推古天皇講授大乘經典，其中就包括了《法華經》。

而在關於太子的許多傳說中，有一則故事是這樣的：



印有聖德太子畫像的舊版日幣一萬元鈔票(1958年)



斑鳩寺金堂與五重塔

聖德太子某次騎馬經過片岡山時，見到一位因飢餓不支而倒在路邊的人。太子見狀便趕緊詢問對方的姓名，然而對方已無力回答，於是他便讓侍從賜給飢者飲食，而且更把自己的外衣脫下，披在對方的身上，詠唱了一首感嘆飢者可憐處境的和歌。

隔天，仍掛念著飢者的太子便派使者前往探視，卻發現對方已經往生，於是太子便指示將他埋葬在當地。然而，之後又過了數日，他卻向近侍坦言當天遇到的飢者，其實並不是普通的凡人，而是得道的真人。

受命再度前往探視的使者，抵達後驚訝地發現墳墓內的屍體已經消失無蹤，只留下太子相贈的外衣。待使者取回衣物，太子便毫不在意地重新穿上，當時的百姓聽聞此事，不禁讚揚說：「只有聖人能夠了解聖人啊！」大家對於太子的崇仰之情更深了。

有趣的是，這則「片岡山飢者傳說」，衍生出了奇妙的後續：

在更晚的情節中，這位飢者其實是漢傳禪宗始祖菩提達摩的化身，聖德太子則是天台二祖南嶽慧思禪師的轉世。由於達摩曾勸慧思轉世至日本弘法，因此片岡山的相逢實為兩人的再會，而當地現在還建有一座達磨寺紀念此事。

與此相關的另一則傳說，則是於太子派遣遣隋使之際，曾叮囑使者取回自己前世為慧思禪師時所常用的《法華經》經本。雖說聖德太子出生時慧思禪師尚未離世，然而乍聽之下如此奇妙的情節，也從側面反映出了《法華經》當時在日本的流傳情形。



四天王寺



達磨寺山門

傳說太子撰有《三經義疏》，分別為《法華經》、《維摩經》與《勝鬘經》三部重要大乘經典的註釋。《三經義疏》以往被視為日本最早的佛學著述而備受推崇，在正倉院寶物中更有傳說為太子親筆寫本的《法華義疏》；關於《三經義疏》的真偽，學術界也產生許多爭議，卻未有決定性的結論。

本書雖以梁代光宅法雲法師的《法華義記》為本，但在兩個地方提出了特別的觀念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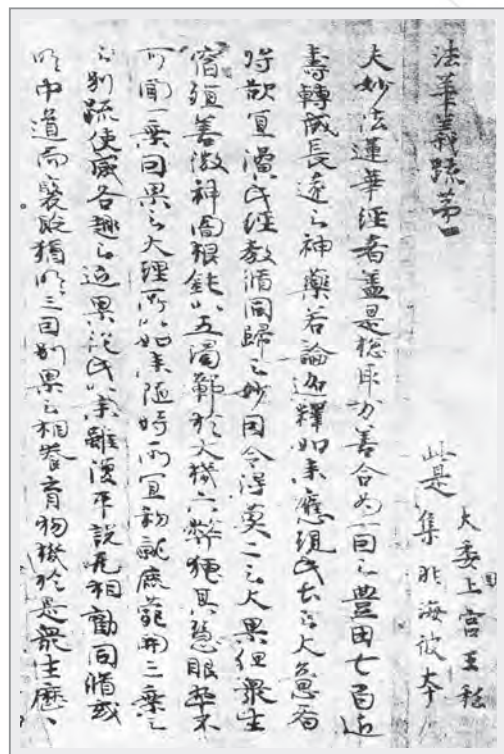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，出現了沒有在其他註釋書中出現的「一大乘」用語。眾所皆知，法華經中提倡「一佛乘」的思想，強調即便是聲聞與緣覺，也終有成佛的一天。或許「一大乘」的用語，是為了強調包容、超越小乘的《法華經》之殊勝吧！

其次，針對〈安樂行品〉中，原先屬於應當親近的「常好坐禪」者，在本書的解釋中，常好坐禪者被視為小乘禪師，而給予了否定的評價：「由有顛倒分別心故，捨此就彼山間常好坐禪。然則何暇弘通此經於世間？故知常好坐禪猶應入不親近境。」反對離開世俗生活的山林修行，可推知其注重在家修行的傾向。

無論其事蹟真假，聖德太子與《法華經》的深厚因緣，預示了《法華經》在日本佛教將擁有的重大影響力。

國家主導的佛教

原先可說由蘇我氏「獨佔」的佛教信仰，於乙巳之變(645)中蘇我氏嫡系遭滅族後，帶來了改變的契機。其後繼位的孝德天皇(645~654在位)與發動乙巳之變的天智天皇(661~668稱制, 668~671在位)，皆著力於興建寺院，積極推動佛教信仰。天武天皇(672~686在位)即位後，更延續此趨勢而推動佛教國家化的政策，強調佛教鎮護國家的用途，同時受到國家的保護與管制，而以護國



傳說為聖德太子親筆寫本的《法華義疏》

法會為首要活動。由此延續至奈良時代(710~794)，持續吸收、仿效唐代的佛教型態，稱為「國家佛教」。

到了聖武天皇(724~749在位)的時代，國家佛教的發展來到最盛期，而《法華經》在其中也發揮了各式各樣的功用。

當時，要成為一名正式的僧侶，並非只要在寺院出家即可，而是需要經過國家的核可。《續日本紀》中記載，天平六年(734)時朝廷所認同的標準：「唯取聞誦《法華經》一部，或《最勝王經》一部，兼解禮佛，淨行三年以上者。」也就是說，能夠背誦出《法華經》，是成為僧侶的必要條件之一，可見《法華經》在日本被視為一部重要的護國經典。

其後，天平十三年(741)三月，朝廷頒布建立國分寺的詔書，使國家佛教迎向了巔峰。

所謂的國分寺制，即是指在全日本諸國(此處的

國是指稱在律令體制下的地方行政區劃)分別各建立一座僧寺與一座尼寺，詔書中並規定每月須舉行誦經及誦戒等佛事。

而之所以要建造國分寺，其實有著深刻的現實因素。自天平七年(735)開始



總國分寺——東大寺(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)



總國分尼寺——法華寺(法華滅罪之寺)



東大寺毗盧遮那大佛

的三年間，天花在九州開始流行，其後更蔓延至全國。在首都平城京（今奈良市西郊）也出現了大量死者，甚至連當時擔負國政大任的藤原四兄弟（藤原不比等之子），也感染了天花而接連亡故；此外，天平前期在政治上也充滿著動盪不安的氛圍與政爭事件。為了平息如此的疾疫及人禍，並祈求長治久安，天皇在篤信佛教的光明皇后（不比等之女）影響下，決意執行此計劃，期望藉由動員「佛力」以達成護國的目標。

有關國分寺制的參考範本，最有力的說法，乃是武則天稱帝時期於全國所建立的大雲寺。兩座寺院的名稱，則分別依據兩大護國經典，僧寺名為「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」，尼寺稱為「法華滅罪之寺」。

再度粉墨登場的《法華經》與滅罪或尼寺的關聯，或許可追溯自經文中龍女成佛的典故，欲滅除經文中所述女性的五種障礙，以求得現在及未來的安樂。

附帶一提，當時設立的總國分寺，便是今日仍為熱門旅遊景點的奈良東大寺。巍峨莊嚴的毗盧遮那大佛，也體現了聖武天皇虔誠的華嚴信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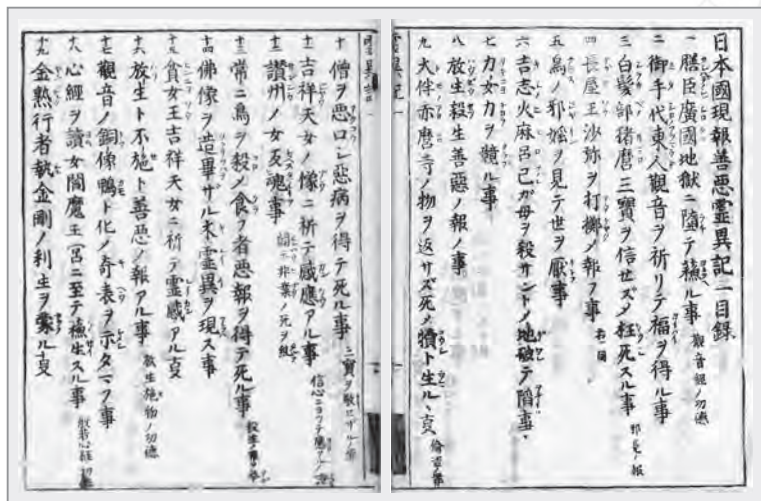
最後，由於國家佛教以護國法會為最重要的活動，因此朝廷需要確保主持法會的僧侶，能夠如法地產生。然而由於當時的日本尚未建立起傳戒制度，因此招請戒師來日便成為當務之急。經過多年的努力，鑑真和尚終於來到日本，開啟了大戒東漸的第一步。然而在其傳戒的事蹟之外，曾經學習過天台教法的他，也攜帶了《摩訶止觀》、《法華玄義》等天台宗章疏前來，透過這些文獻，《法華經》在日本進一步增加其影響力。



鑑真和尚東渡圖

民間信仰的伏流

對於當權者而言，《法華經》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保護國家免於各種災難的侵襲。但是，《法華經》並非只在宮廷之中流傳，民間也有許多崇敬這部經的百姓們，他們的信仰又是怎麼樣的呢？



重刻自西元1714年版本的《日本靈異記》目錄

十分幸運的是，《日本靈異記》中收錄的許多故事，提供我們生動的答案。約成書於弘仁十三年(822)的《日本靈異記》，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說話集。所謂說話，是指自古以來民眾代代口耳相傳的故事，將之記錄成書，便稱為說話集。本書的編者景戒，早年曾作為私度僧(未經國家認可而自度為僧者)，過著半僧半俗的生活，其後入平城京藥師寺成為國家管制之下的官僧，可說是經歷過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人。

從全名《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》可知，本書中收錄的奇聞異事，大部分都圍繞著「靈異」——不尋常、超自然，以及異常的現象——這個主題而闡述。在景戒及時人看來，這些靈異現象的原因，追根究柢，其實在於佛法所說的因果報應所導致，特別強調了「現報」的概念。因此，本書編纂之目的便在於宣揚善惡有報的法則，勸導讀者皈依佛法，敬重三寶(和其象徵的佛像、經典、僧眾)。

本書收錄許多與《法華經》相關的故事，可見到信仰此經帶來功德與福報的際遇，同時也有誹謗之而遭受惡報天罰的情節。其中有一則故事是這樣的：

在美作國(今岡山縣東北部)英多郡這個地方，有一座出產鐵礦的山，受到政府管制。

於孝謙天皇(聖武天皇之女)在位的時代，國司(地方長官)徵召了十名工人，到山上開採鐵礦。沒想到礦坑的出口卻突然開始晃動，工人見狀萬分驚恐，搶

著要趕緊出來到外面，最後出口果然因為崩塌而無法通行。然而，十人中卻只有九人順利逃出，剩一人仍困在礦坑中。面對這樣的意外，哭紅了雙眼、鎮日憂愁悲傷不已的妻子，決心繪製一幅觀音像，並連續七日書寫〈普門品〉，盼能將福力迴向予丈夫。

沒想到，此時工人尚存一息，內心思忖著：「我以前曾經發願書寫一部《法華經》，可惜尚未成就。若我之後能活著離開礦坑，必定要完成這項心願啊！」不過當下的狀況不容他樂觀，礦工想：自己活到了現在，還沒有經歷過比目前更慘的情形，實在太令人難過了。

突然，坑道上方突然有一處開了小洞，讓日光照了進來。其後，更有一位沙彌模樣的人從洞口現身，帶著豐盛的飯菜，告訴工人說：「由於你的妻子供我飲食，讓我來救你，加上又聽到你哭愁莫展的樣子，於是便前來此處。」說完這句話後，沙彌又從洞口出去。

之後不久，洞口漸漸擴大。此時正好有一行三十餘人經過洞穴附近，工人隨即把握機會呼救，終於成功脫困。

工人回到家中，妻子和親人都破涕為笑。聽聞此事的國司便詢問他：「你是做了什麼樣的善事才成功離開礦坑呢？」工人便老實回答。知悉了情況的國司，之後率領了地方的信眾，一同書寫《法華經》，並舉行供養法會。

景戒在最後則認為，這就是《法華經》與觀音菩薩神力之展現，不禁感嘆「更莫疑之矣！」可知當時《法華經》被視為深具靈驗之力的經典，受到民眾的崇仰。

後世《法華經》靈驗故事的結集，則以鎮源於1004年左右編纂成的《大日本國法華經驗記》為代表，其中敘述了許多《法華經》持經者的事蹟。

寫經與講經

由於在《法華經》〈法師品〉當中，強調了受持、讀誦、解說、書寫等流通經典的各種方式及其功德，因此，在印度或者中國，一直都十分盛行以書寫來傳布《法華經》。而日本也不例外，從庶民、僧侶乃至貴族、天皇，不論貧

富及階層差異，都熱中於抄寫《法華經》。

根據文獻記載，最早的《法華經》寫經，是在神龜三年(726)時，聖武天皇為了祈求伯母元正上皇(父親文武天皇的姐姐)疾病的痊癒，因而下令抄寫《法華經》；其後於天平二十年(748)，亦再度為了已過世的元正上皇追善供養之故，下令抄寫一千部的《法華經》。

進入平安時代後，寫經的形式更趨多樣，身為功德主的公卿貴族們，競相投入了巨大的金錢與人力，只為了用最華麗美觀的方式，寫出充滿藝術感的《法華經》：例如在紺紙上以金泥書寫經文，或者在紙上畫出草木以及鳥獸等等的圖樣，這種裝飾經的流行，一時蔚為潮流，風靡了整座平安京。

除此之外，更有在紙上繪製一個個的蓮花台，其後將經文一字字填入蓮花台的「蓮台經」，以及與此類似，將經文填入寶塔圖案中的「寶塔經」；更甚者，還有在紙上繪製出無數的小佛像，其後在佛像旁寫上經文的「一字一佛經」。

在稍晚的鎌倉時代，更出現了所謂的「金字寶塔曼荼羅」，將原先以繪畫方式完成的寶塔，改用一字字的經文堆疊、交錯而完成，其複雜程度與創意，可說是寫經之巔峰，亦可見當時貴族熱衷於寫經的程度。

到了平安時代的後期(約11世紀後)，貴族間開始流行「埋經」。所謂的埋經，是稱經典書寫完畢後，將其放入經筒中埋入地下。此種風尚之流行，受到了末法思想以及彌勒佛下生信仰的影響。



著名裝飾經《平家納經》中收錄的《法華經》經卷



收納《平家納經》經卷的金銀裝雲龍紋銅製經箱

埋經的貴族們，期盼透過書寫經典所得的功德，帶領他們於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，彌勒佛自兜率下院投生娑婆世界時，親見彌勒並參與龍華三會的說法盛事。因此，連世俗權勢盛極一時的藤原道長(966~1027)，也曾用紺紙金泥所書寫的《法華經》埋納於金峰山；然而該經筒於17世紀末便重見天日，目前作為最早的現存經筒而被指定為國寶。

隨著寫經之流行，《法華經》的講經會也跟著開始出現。法華會的開始，雖如前述，可追溯自聖德太子於宮中所舉行之講會；然現今之形式，最早據傳是在天平十八年(746)，由良弁於東大寺羅索院，為了鎮護國家而修。其後，在民間則開始興起為往生者超薦祈福的法華會，其中則以「法華八講」最著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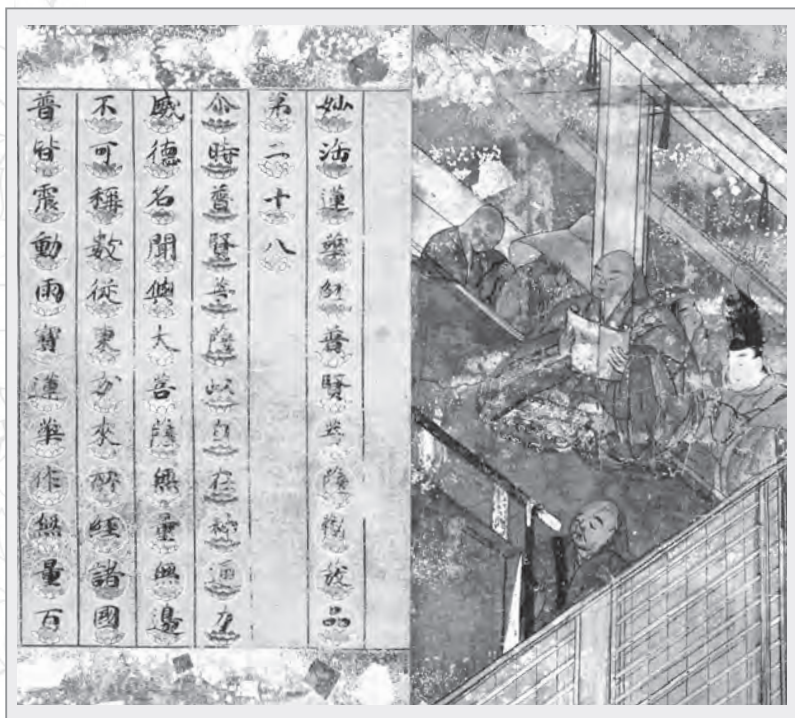
據說由勤操為友人榮好之母超薦供養所舉辦的《法華經》法會，乃是法華八講之始。根據說話集《三寶繪》的記載，其因緣是這樣的：

榮好在出家後，仍供養著住在寺院旁的年邁母親，總是將他一部份的食物，交由一位少年僧代為送餐而毫無懈怠之意。

然而孝順的榮好某日卻突然過世了。面對著不知如何是好的少年僧，勤操

決定代替朋友繼續供養，同時叮囑少年僧不要將榮好的死訊告訴他母親。

當母親對於榮好許久未來拜訪而心生疑惑時，少年僧便用各種藉口搪塞過去。之後某日，勤操由於接待了許多客人，喝了點藥酒而睡著了，也延誤了送餐的時間。送達後面對老母親追問的少年僧，終於誠實地將榮好的死訊告知了對方。年衰體弱的老母親，禁不住打擊便往生了。



12世紀《一字蓮臺法華經》經卷，收藏於日本大和文華館

聽聞此事的勤操，對於自己的行為深深地感到後悔，與其他法師商量後，決定在四十九日期間，每週由八人分擔《法華經》八卷的講解，並立誓此後每年忌日皆應如此進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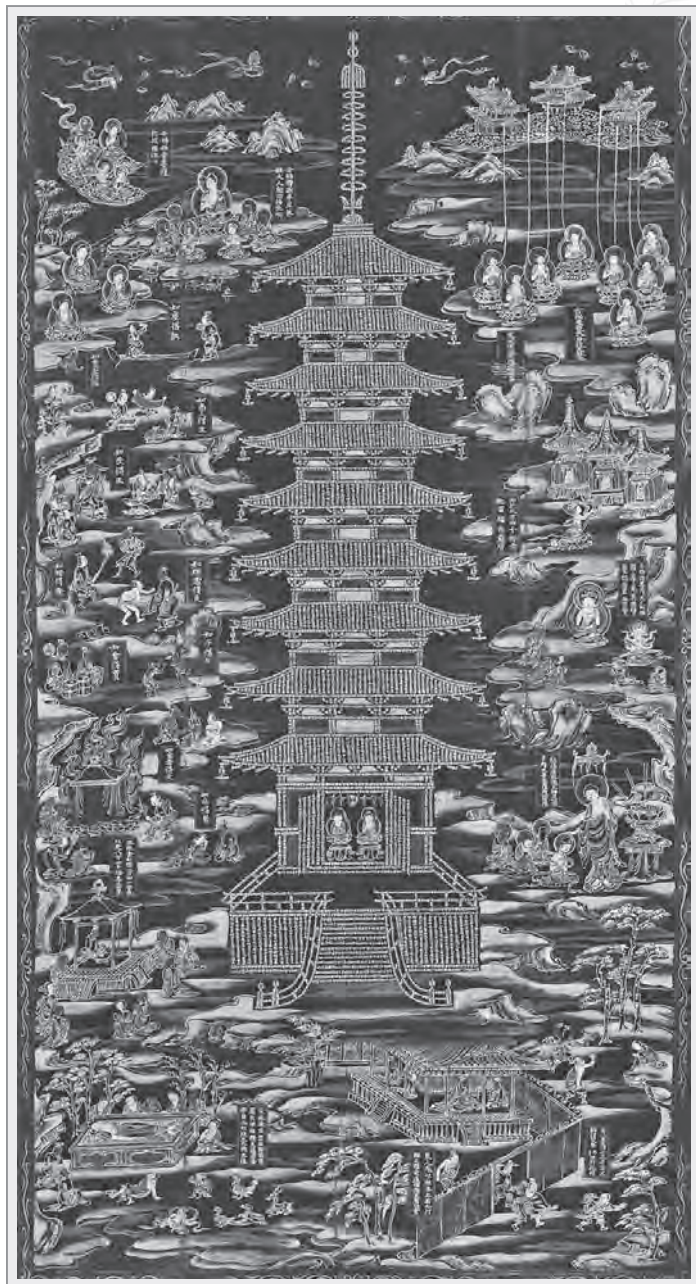
此後，法華八講漸成為最流行的法華會形式；此外更有將法華三經的開經《無量義經》與結經《普賢觀經》加入而成為「法華十講」，也有將《法華經》二十八品再加上開結二經而成的「法華三十講」等各種形式。

小結

以上簡單概述了《法華經》於鎌倉時代前，除宗派思想以外，在日本的流傳情形。其實在文中所介紹的內容之外，還有許多沒有提到的部分，特別是限於篇幅限制，未對天台宗與日蓮宗進行介紹，盼望之後能有機會，再向讀者一一介紹。🕯

主要參考資料

- 菅野博史，《法華經入門》。東京：岩波書店，2001年。（特別是「寫經與講經」部分）
- 末木文美士，《日本佛教史—思想史としてのアプローチ》。東京：新潮社，平成八年。
- 末木文美士（編），辛如意（譯），《日本佛教的基礎—日本I》（新亞洲佛教史11）。台北：法鼓文化，2019年。



13世紀《紺紙金銀泥法華經寶塔曼荼羅圖》